

中國思潮評論



高瑞泉 主编

现代性视野中的思潮与观念

- | | |
|-----------------------|-----|
| 论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许纪霖 |
| 革命进化论与陈独秀的启蒙激进主义 | 高力克 |
| 杜威进化思想与胡适、贺麟之阐发 | 顾红亮 |
| 现代性与中国 | 杨春时 |
| 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中的传统文化 | 许苏民 |
| 激进主义、现代情境以及中国无政府主义之崛起 | 杨芳燕 |
| 民初政治调和思潮的衰落 | 胡丽娟 |
| 以今论古与自西徂东：平等观念史两章 | 高瑞泉 |
| 张佛泉自由论述的演变及其动因 | 何卓恩 |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思潮評論



高瑞泉 主編

现代性视野中的思潮与观念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视野中的思潮与观念/高瑞泉主编. —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10. 11
(中国思潮评论; 2)
ISBN 978 - 7 - 5325 - 5682 - 3

I. ①现... II. ①高... III. ①社会思潮—研究—中国—
现代 IV. ①D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0052 号

中国思潮·第2辑

现代性视野中的思潮与观念

高瑞泉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9.75 插页 2 字数 251,000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5682—3

B · 705 定价: 36.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

《中国思潮评论》

主 编 高瑞泉

编辑委员会

陈少明	陈卫平	胡伟希	胡逢祥
干春松	高力克	高瑞泉	顾红亮
郭齐勇	李维武	齐卫平	吴根友
许纪霖	许苏民	张利民	郑大华

序

编辑《中国思潮评论》最直接的目标,是为了推动和展示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学术研究。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多种进路,“思潮研究”即是其中重要之一途。其原因大约有三:第一,与人物个案、主义或问题之进路相比,“思潮研究”更具有历史整体性,它要求从现象出发,注意到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变迁之来龙去脉。第二,它不能停留在一般学科史的分隔,须兼顾到学术研究“内在”和“外在”两个理路,或者说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第三,它并不先行确定某一种思想派别拥有最高裁判权,也不认为互相攻讦的思潮完全形同水火,而试图发现在名言和主义的争论背面隐蔽着的某些东西。

中国人素有厚古薄今的传统,经过“五四”所谓“激烈反传统”以后,据说已经变得一切惟新是求,而时尚之谓“新”常常与纽约、巴黎有关。晚近十年间,风气又经丕变,“修旧如新”一变而为“修旧如旧”。奇怪的是,这两样东西似乎并行而不悖。总而言之,虽然不断有人宣称已经勘明了中国文化的最终走向,“古今中西”之类的争论还是紧紧纠缠着国人。与此相应的是,对于今日中国的崛起,有些外国观察家以为中国并不可畏,因为缺少堪与西方匹敌的社会理论,他们不明白促成中国崛起的文化动力——现代中国文化之道——可能正隐身在看似纷乱的思潮更替之中。

前清诗人哲学家龚自珍曾说过:“诚知圣人之文,贵乎知始与卒之

间也。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牖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不过,19世纪中叶的这位预言家对于“圣人”其实已经有点保留。因为他同时又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所以他要通过广泛的历史文化批判来追寻中国变革的大道。思潮研究的另一面就是历史文化批判,这种批判同时是社会批判和文化反省,它同其他追求智慧的进路一样,也是“为己之学”。中国人之众,哪一个敢说自己在某种思潮之中?因此,如果我们有更高的期许,研究众多中国思潮的消长起落的过程,其实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一个历史入口,在这里,同样有希望进达天人之际、幽明之序。所以,《维摩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是为序。

高瑞泉

2009年7月16日

目 录

- 001 序
- 001 进化论思潮研究
- 003 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许纪霖)
- 036 革命进化论与陈独秀的启蒙激进主义(高力克)
- 054 杜威的进化思想与胡适、贺麟的阐发(顾红亮)
- 073 中国的现代性
- 075 现代性与中国(杨春时)
- 091 古代圣哲的诡谲微笑——论 20 世纪中国社会思潮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许苏民)
- 118 现代性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俞兆平)
- 140 论“新边塞文学”的革命性与现代性叙事(逢增玉)
- 155 民国初年社会思潮
- 157 激进主义、现代情境以及中国无政府主义之崛起(杨芳燕)
- 192 民初政治调和思潮的衰落——以“全赢博弈”模式审视之(胡丽娟)
- 237 思潮与观念
- 239 以今论古与自西徂东:平等的观念史两章(高瑞泉)
- 276 从“邦国”下的“自由”到“自由”下的“邦国”——张佛泉自由论述的演变及其动因(何卓恩)
- 291 日译概念词“科学”的生成由来(俞喆)
- 307 编后记
- 309 本辑作者简介

进化论思潮研究



现代性的歧路

——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许纪霖

19世纪中叶以后,富强一直是中国人追逐的梦想。如何实现富强?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主宰了中国人的灵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清末民初许多知识分子信奉的富强之路,同时也成为他们新的人生信念。杜亚泉在民国初年如此评说:“生存竞争之学说,输入吾国以后,其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十余年来,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1]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所至,产生了一个崇尚物质、崇拜强权的力的秩序,它颠覆了传统中国温情脉脉的礼的秩序,代之以残酷无情的优胜劣汰、强权主宰、赢者通吃。这一以竞争为动力的富强之路,最后究竟造就了民国,还是毁了共和?本文将通过清末民初思想观念与社会秩序的互动研究,总结那段深刻的历史教训,以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一、从礼的秩序到力的秩序

清朝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三千年大变局”。自春秋战

[1]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

国时代以后,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礼崩乐坏。原来维持了中国数千年的,是儒家的纲常名教,统治者以仁政治理天下,士大夫精英以德性教化百姓,而民众各安其位,与世无争,维持了一个普天之下的礼治秩序。然而,到了晚清末年,天下的礼治秩序受到内忧外患冲击,大乱阵脚。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之下,一个新的秩序观念产生了,那就是以国家为核心的力的秩序。

新秩序的建立有一个从旧秩序中蜕变的过程。1860年开始的自强运动,设想的是传统的纲常名教不变,引进西方的富强之术,这是张之洞所谓的“中体西用”之路。然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引发了激进的制度变法和观念启蒙,其背后的理论纲领正是从达尔文到斯宾塞的历史进化论。进化论是对社会秩序的一次颠覆性革命,从此礼的秩序失去了正当性基础,逐渐为一种更富竞争力的力的秩序所取代。如果说,力的秩序在晚清还仅仅是观念形态的话,到民国建立之后,礼教秩序随着王权的崩塌全面解体,力的秩序大行其道。杜亚泉在1916年的《东方杂志》中写道:

今日之社会,几纯然为物质的势力,精神界中,殆无势力之可言……其弥漫于吾社会之间者,物质之势力也。物质之种类甚多,而其代表之者则为金钱,今日之独占势力于吾社会者,金钱而已矣。〔2〕

杜亚泉这里所说的物质势力,相对于精神而言,当作广义解读。在天下礼治秩序之中,物质之力并不具有道德的正当性,秩序的正当性源头来自具有超越性的人文精神。当清末民初中国由天下转化为国家之后,作为亚洲第一共和国的中华民国,却失去了道德与精神的正当性源头,各种物质势力猖獗:军事势力、金钱势力、政客势力……各种势力争相竞争,有力便是一切,优胜劣败,强者生存。从1895年到1915年,

〔2〕杜亚泉:《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杜亚泉文存》,第284—285页。

短短二十年间,礼的秩序迅速解体,代之以一种新的力的秩序。力的秩序的形成,虽则发端于1895年之后历史进化论的引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自强运动之中,富强之力便悄悄地镶嵌入传统的礼治秩序,内化为旧秩序的一部分。以力为轴心的富强追求,并非纯粹由进化论带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思想传统在历史大变局中自身调整、不同趋势内在消长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西方的进化论进入中国之前,儒家的主流价值已经发生了一个从经世到富强、从义理到时势的变化。

在古代中国,作为帝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一直将对德性的追求作为人生和政治的最基本价值。在儒家民本主义价值观主导下,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一直在国家富强之上。及至晚清,风气大变,国富压倒民生,功利压倒道义,自洋务运动之后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风气和潮流。一般而言,在古代诸子百家之中,对政治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法家。汉武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儒家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法家对于政治的影响并未消失。相对于儒家的道德政治和民生政治,法家走的是功利主义的现实路线,先秦的法家从商鞅到韩非子,无不重视富国强兵,追求统一天下的霸业。而儒家在其自身历史发展和演化之中,也不断吸取其他各家的思想资源,成为一个具有多元价值趋向的思想传统。在儒家思想内部,除了修身之外,还有经世的另一面。^[3]修身思想来自于自孔孟开始到宋明理学被发扬光大的道德政治传统,而经世思想则从先秦的荀子发端,中经西汉的贾谊到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儒家传统。特别是宋以后,外患严重,国力衰落,儒家内部功利主义经世传统重新崛起,与朱熹的正宗理学形成了抗衡。从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到明代的张居正、顾炎武、黄宗羲,皆反对空谈心性义理,注重实学和经世致用。功利主义儒家特别是王

[3] 关于儒家的经世传统,张灏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参见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载《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81页。

安石、张居正,虽然也注重富国强兵,但与法家不同,国家富强本身只是实现天下之治的手段,本身不具有内在价值,在义理上最后还是要落实在民生上。

儒家的经世思想传统,在晚清日趋严峻的内忧外患逼迫之下,无论在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内部都强劲崛起。张灏分析过晚清经世致用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以《大学》为本的致用精神。《大学》的修齐治平,从修身出发,最后落实在治国平天下,经世成为修身的最终目标。另一种模式是以制度安排为本位,“这种类型的致用精神是以功利主义为本,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以客观制度的安排和调整为其达到目的的途径。这种致用精神的代表人物是魏源和冯桂芬”。^[4]在这里,值得重视的是后一种经世模式的出现,这种“以功利主义为本,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经世模式后来压倒了前一种道德政治的经世模式,成为晚清思想的主流。在自强运动之中,曾国藩虽然注意发展洋枪炮,但作为理学家的他,其最后目标还是落实在民生。到了更现实主义的李鸿章,其洋务的政策举措,只剩下法家式的国家富强。李鸿章幕下的马建忠说得很明确:“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5]在晚清,国家富强逐渐成为中心,民生降到了第二位。19世纪中叶洋务派与清流派的争论,部分与此相关,洋务派追求的是国家富强,而清流派从传统的民生和道义立场,对此大加批评。不过,浮士德式的追求财富和国家富强一旦从潘朵拉盒子里面释放出来以后,就再也无法收回去了。清流衰落之后,经世和富强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爱国主义成为最高评价,爱民主义从此鲜有人提。^[6]

[4] 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2—23页。

[5] 马建忠:《富民说》,《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03页。

[6] 关于晚清的洋务与清流的冲突以及富强思潮的弥漫,杨国强有非常详细和精彩的分析,参见杨国强:《清流与名士》,载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6—214页。

列奥·施特劳斯在论述西方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时,将第一次浪潮看作是“将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以及设想自然必须披上作为单纯人工制品的文明产物之外衣”。作为现代性第一次浪潮的代表人物,霍布斯用自我保存来理解自然法,用人的权利代替自然法,其结果“乃是对经济的日益强调”。^[7]中国现代性的开端亦是如此。在日益严峻的国势衰落面前,儒家原有的功利主义精神被释放出来,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第一步是从德性政治转变为重视经济民生的功利主义,第二步便是从重视民生的功利主义发展为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

中国历史上儒法之间的王道和霸道之争,其实质就是政治正当性究竟应该以民生还是以国富为基础的争论。当晚清强大的功利主义潮流崛起的时候,儒家的经世精神与法家的富国强兵论产生了奇妙的合流,虽然新的王霸之争以清流和洋务的冲突一度展开,但并没有持续多久。相反地,在新崛起的维新派思想家视野之中,国民的权益和国家的富强不仅不相冲突,而且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观之,国民之私利与国家的富强,反而可以“合私为公”,相得益彰。王韬在19世纪中叶就敏锐地觉察到“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8]于是,从儒家的经世传统与法家的富国强兵传统内在结合,产生了不可阻挡的以国家富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潮流。虽然自强运动的“中体西用”思想模式将富强阻击在用的层次,但在日益加深的亡国灭种危险局势下,只有富强才能保种保国,乃至最后保教,也是张之洞们所不得不承认的。正如王尔敏所指出的:“近代思潮之自具特色独成风气者,尚亦具有统一宗旨与共同趋势;抑且尚能综括全貌,可以一言以蔽之,则所谓足以纲纪一代思

[7] 列奥·施特劳斯著,丁耘译:《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学术思想评论》第6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3页。

[8] 王韬:《洋务上》,载《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潮而构成一代主流之核心者,实为富强思想。”^[9]富强这一新的纲纪,不待康梁一代登上历史舞台,实际在自强运动之中,已经呼之欲出了。

除了从经世到富强之外,儒家价值的另外一个变化是从义理到时势。宋明理学,乃是义理之学,儒家义理,万世不易,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家义理,既是王朝正当性的世俗源头,也是天下士大夫清议的共同价值。然而到了晚清,义理开始被一个新的概念时势所取代。当李鸿章脱口而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就意味着顺应时势、及时应变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了。晚清的各种文献之中,“世变”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流行词。世道变了,变化的不仅是外部的时势,而且是历史的内在之道“运会”。“运会”说来自宋儒邵雍,其基于有秩序之时间变化的观念,一年之中有年月日时四种数字,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然后配合演衍,表示世、运、会、元之始终,以此说明“世变”并非偶然来由,而是出自天地自然的客观运转,人们无法抗拒,只能顺应时势,及时应变。^[10]

世道的变化,与时势有关。根据汪晖的研究,时势是一个将历史的断裂转换为连续的概念。宋儒以理释天,将时势替换为理势,用来解释圣王之势为什么会转化,以此在历史变迁中论证天理的普遍存在,论证三代理想的变迁和发展。^[11]不过,在宋明理学之中,时间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念,一直到明清之际,时间意识才真正产生。^[12]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将义理置于历史的变化之中,王船山的“理势”概念则将理同时视作势,制度不仅要符合天理,而且也要符合势,符合历史的

[9]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10] 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14页。

[11]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1部,第55—61页。

[12] 陈赞:《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2—505页。

变迁和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儒家义理之中,时势原本是以古代的三代为理想,是现在向古代的回归,而到明清之际,时势的内涵则改变了变化的方向。如果说“世运”说还带有历史循环论的意味的话,那么,晚清所复兴的公羊三世说突破了历史循环论,有了向未来的趋势,康有为认为:“《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13]世不同,道就不同。儒家义理不再是万古长青、永恒不变,而是要与时俱进。这就是世道的变化。于是时势的重要性超过了义理本身。与其钻研古人的义理,不如了解时势的变化。王韬说:今日“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14]康有为因此还将孔子本人称为“圣之时者”,^[15]是最了解时势的圣人。为了挽救时运,一种新的“运会”说——以富强为轴心的历史进化论,一经严复引进中国,便迅速成为涤荡神州的狂飙。

二、力本论中的竞争与强权

进化论进入中国,乃是一场颠覆性的思想革命。20 世纪之初,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说:

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16]

进化论的核心是生存竞争说,它改变了中国人对宇宙和历史的整

[13]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序》,《康有为全集》第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4]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5]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8页。

[16]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体想象,使得重构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成为迫不及待的现实。在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之中,欧洲的思想家们是以人性论为基点论证新的社会秩序,而在近代中国,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则是通过自然和历史的进化过程,来推导新的民族国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呢?

进化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力本论的宇宙观,它与儒家以德为本的宇宙观截然不同。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力的位置一直是缺席的。在原始社会,为了获取事物,与大自然奋斗,力作为一种感性的生命力量,尚有其一席之地。然而,当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在西周和儒家的思想中很早便出现了德的概念,德成为从宇宙秩序到社会秩序乃至心灵秩序的核心。世界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它是有德的,宇宙的德性与人间的德性相通,构成了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思想的内核。以德为中心的世界是一个礼的世界,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天下意识一致。只要天下不亡,这个世界就依然以华夏的礼为核心,按照普遍的、同一的德性原则来安排宇宙、社会和人心秩序。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天下在西方的船坚炮利冲击下轰然倒塌,以华夏为中心的礼的世界彻底崩溃了。严复介绍进中国的斯宾塞的历史进化论,为力在中国的登台亮相,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想舞台。早年章太炎也是进化论的信徒,翻译《斯宾塞全集》,首译斯氏的《论进境之理》。进化论以牛顿的力学世界观为基础,将力看成是万物变化的源泉,也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严复讲“鼓民力”,在他这里,力的含义还比较狭窄,局限在感性生命的体力层面。力本论的最有影响的传播者是梁启超,在梁那里,力的内涵则要宽广得多,有“心力”、“胆力”和“体力”三种,涵盖了知性、意志和体力三个层面,[17]之所以如此,乃是梁启超在1898年的时候,其宇宙观已经发生

[17] 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12—713页。